



红八月

紫竹 著

责任编辑：向 琿
版面设计：侯国强

The Red August © 2023 by Yunzheng Ren

Published by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Montgomery, Alabama, U.S.A.
<http://www.dixiewpublish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The only exception is by a reviewer, who may quote short excerpts in a review.

本书由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2023 年 7 月 DWPC 第一版

开本：229mm x 152mm
字数：141 千字

Library of Congress Preassigned Control Number : 2023941321
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号码：2023941321

国际标准书号 ISBN-13 : 978-1-68372-557-2

《《 作者简介 》》



紫竹，当年北京八中学生，如今是商务印书馆退休员工。

《《 前言 》》

这是一部历史小说，讲述了1966年8月发生在北京城里的一件小事。故事曲折而惊险，对于那些未曾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来说，它读起来像一篇传奇；但对于千百万亲身经历过文革风雨的中国百姓来说，它读起来更像一页历史。不过作者的本意是在讲故事而不是写历史。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写历史需要有勇气，需要有太史令董狐那种“虽斧钺在前而其志不改”的大智大勇，讲故事则就轻松多了。不过作者还是希望，这个故事能够“为历史作见证，为死难者传心声”。

This is a history-novel written in Chinese simple character, which tells a legendary story, terrible and beautiful, about a boy and a girl in the summer of 1966 in Beijing.

紫竹 1996年于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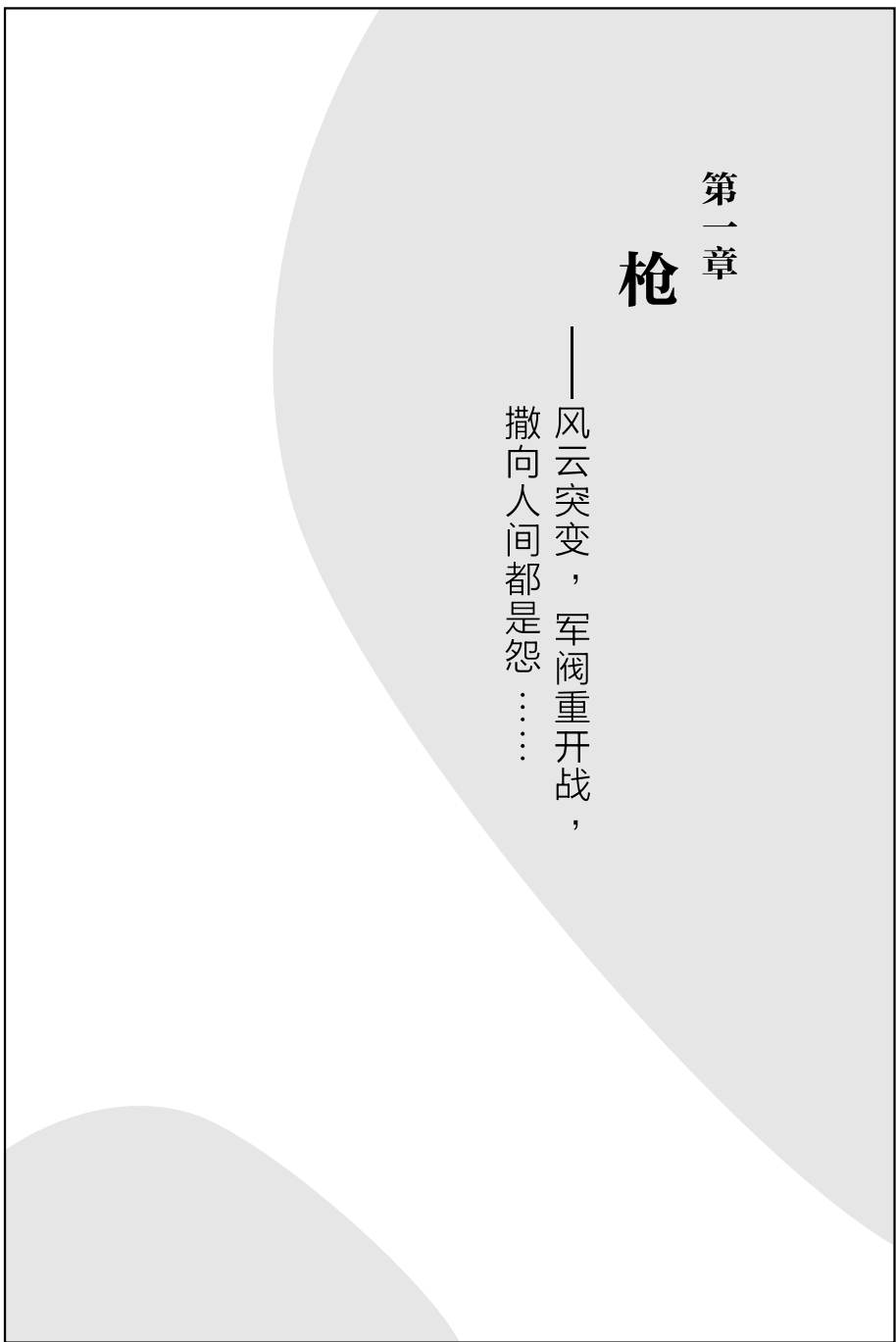
《《 目 录 》》

第一章 · 枪	001
第二章 · 夜	063
第三章 · 黎明前	117
第四章 · 慈母心	157
第五章 · 壮士血	183
第六章 · 群情尽望春	207

第一章

枪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
撒向人间都是怨……



1966年8月22日，上午10时许。

在北京市第八中学高一（四）班的教室里，苏小农正在主持“八·一八座谈会”。两个多月来，全班同学以平等的身份坐在一起开会，这还是第一次。身为高一（四）班文化革命领导小组负责人的苏小农从心底感到欣慰。

坐落在城西按院胡同的第八中学是北京城里大名鼎鼎的重点学校。在六十年代初，所谓重点学校就是指那些高考升学率高，被市里有关部门列为重点扶持对象，在资金、师资配置方面予以优先照顾的学校。当时高考升学率在百分之八十以上，享受重点扶持待遇的学校屈指可数，其中四中、师大女附中名列榜首，其次就要数八中、清华附中和101中学等几所学校了。

当年的八中是一所男校，除初一年级五个实验班中有不足一百名女生外，其他年级都是清一色的男生。八中的学生大多来自社会中上层，他们的父辈不是新社会的权贵——新中国政府的部长、将军和北京市各级党政机关的负责人，就是来自旧社会的精英——文化学术界的名流、著名企业家、银行家和高级民主人士，以及国民党军队的起义将领，归顺新中国的旧政府高级职员。说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然而在八中这样一所国家重点扶持的名牌学校中，工人——国家名义上的统治者——的子女却少得有如凤毛麟角，农民——统治阶级的同盟军——的子弟在八中则更是找都很难找到一个。八中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是在初中、高中的升学考试中，经过激烈竞争，以优异的成绩考进来的。他们无论从天赋还是从学习能力上讲都可以说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但也有少数学生不是凭借考试成绩，而是凭借父母显赫的地位，凭借市委、市教育局的条子，堂而皇之地挤进来的。也许是天赋聪颖，也许是受家

庭的熏陶，在思想意识方面，八中的学生们大多成熟得比较早，远在“文化革命”爆发前，学校各个班，特别是在高年级各个班中，学生们便已在无形中分化为“两大阵营”——以干部子弟为核心的“红色阵营”，以及以知识分子子弟为核心的“白色阵营”。准确地说，红色阵营的形成是自觉的，是干部子弟有意识地团结在一起而形成的。白色阵营的形成则是被动的，是非干部子弟的同学们受干部子弟排斥，自然而然聚集在一起而形成的。

六十年代初，经历了大跃进的失败，中共高层领导已开始意识到，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最重要的是人才，是掌握了科学文化知识的人才。以彭真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应该说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集体。在大跃进失败、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之际，他们痛定思痛，把抓好人才的培育作为从根本上扭转局面的重要措施。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抓教育就要从根本，从基础教育抓起。为提高北京市中学教育质量，市委年年搞高考升学率的校际评比，不惜拨巨款资助、奖励在竞争中达标或有突出进步的学校。这一举措极大地调动了各个学校抓教育质量，抓高考升学率的积极性。

在此背景之下，学习成绩的优劣便成为各个学校衡量一个学生好坏的最高标准。学习成绩优秀者成为老师的宠儿和同学们敬重的对象，而学习成绩低下者则成为老师们训斥和同学们嘲讽的对象，常常被各个学校视为包袱与负担。当然，在学习这一方面，干部子弟大多竞争不过知识分子子弟与来自旧社会名门望族的子弟。各个学校，特别是一些重点学校，为了安抚干部子弟，补偿他们心理上的失落感，根据市委有关领导的授意，有意识地在政治方面作出让步，大力培养干部子弟出任各班级团支部乃至学校团委会的领导职务，并在高二、高三年级吸收部分高级干部子弟入党。不过，这一切努力但未能消除干部子弟心中的不满，相反更增强了他们“自

来红”的优越感。干部子弟们学习成绩欠佳，在学校得不到同学与老师的尊重，并不认为是自己努力不够，相反，他们觉得这是由于学校当局对他们关心、爱护不够，重视、照顾不足，未能全面贯彻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推行了一套认人唯分、分数至上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这种不满情绪长期孕育，终于在“文化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以特殊的方式爆发了出来。

小苏还清楚地记得52天前，1966年6月1日晚，聂元梓大字报的发表在干部子弟中所引起的强烈震动。第二天，6月2日上午，高二（三）班的计三猛就率先在学校中厅贴出了全校第一张大字报，指名攻击校长温寒江和校党支部书记华锦，指责他们排斥、打击工农子弟和革命干部子弟，推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是北京市彭真反党集团的马前卒。计三猛的大字报犹如一枚重磅炸弹打破了校园中的宁静。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反对党的基层领导就等于反党、反社会主义。身为知识分子的教师对此更有一层深切的体验。1957年，在伟大领袖发起的那场可怕的“阳谋”中，五十五万天真的知识分子仅仅因为给领导提了一些意见，仅仅因为看不惯大小官员的官僚作风便被打成了右派，打入了人间地狱。不少人至今仍在北大荒，仍在戈壁沙滩的各式监狱、劳改农场中服苦役。侥幸未入狱者亦被一顶右派的大帽子压得直不起腰来。教授烧锅炉，医生掏大粪，这还都算是对“罪行”较轻者的宽容。今天聂元梓大字报的发表，是一场清除贪官污吏的伟大革命的信号，还是又一次请君入瓮式的新“阳谋”，全校师生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然而那些身世显赫，多少了解一些党内斗争之内幕的干部子弟们却纷纷步计三猛的后尘，以大字报、小字报的形式猛烈攻击学校领导，攻击北京市委彭真集团的反党罪行。等全校师生从连篇累牍的报纸社论中意识到今非昔比，这是一场革命，一

场由伟大领袖亲自发动的涤污荡垢的“文化革命”时，干部子弟们已控制了全校局势。他们自行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一边揪斗学校领导，一边大张旗鼓地批判所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从更广阔的背景来看，聂元梓大字报的发表不仅在八中，同时亦在北京五十多所高等院校及三百多所中学里引起了强烈反响。共产党十七年来集权专政，大大小小的官员高高在上、作威作福，民间早已积累了强烈的不满。在中央文革的煽动下，首都高等院校的师生率先举起了造反的大旗，锋芒所向，直指各高校党政领导和整个共产党官僚体系。当时在京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为制止动乱，稳定局面，一面通过新华社发布消息，改组北京市委，改组北大党委，一面紧急从中央各部委抽调干部，组成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各大中学校。

在各高等院校中，干部子弟毕竟是少数，以非干部子弟为主体的造反派学生，在中央文革的暗中支持下，根本不把刘邓工作组放在眼里，继续大造学校当局的反，大造共产党的反。但在各个中学，特别是干部子弟人数众多的西城区各中学，工作组的进驻则受到了干部子弟们的热烈欢迎。在刘邓的直接指挥下，工作组审时度势，一边积极支持各校以干部子弟为主体的文化革命委员会，一边不动声色地把斗争锋芒向下引，从批斗各校党政领导逐步引向批判斗争出身不好的老师、学生，也就是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具体执行者与受益者。一时间，各中学内“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论调甚嚣尘上。根据这幅著名的对联，同学们被划为三六九等。革命军人、革命干部、革命烈士、工人及贫下中农的子弟被称为“红五类”，是天生的革命者。政府小职员，各类知识分子的子弟则被划为有待加强思想改造，克服来自家庭不良影响

的“黄崽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的女儿女则被划为生而有罪，必须与家庭划清界限，彻底转变立场的“黑崽子”。

按照“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理论，有问题的黄崽子和反革命的黑崽子们必须接受监督与改造。于是乎出身不好的同学和老师很快就成为干部子弟发泄多年来所积蓄的不满情绪的出气筒，成了被批判、被斗争的对象。然而就在北京市各个中学里无产阶级专政秩序井然，黑崽子、黄崽子们被压得抬不起头来之际，各高等院校内的造反派却闹翻了天。刘邓工作组非但压制不住中央文革暗中支持的造反派学生，反而成了众矢之的，成了“压制群众，压制革命的罪魁祸首”。7月下旬，毛泽东“周游列国”，取得各大军区的支持后施施然回到北京。他指责刘邓派工作组是压制群众，压制革命，下令撤退工作组。7月28日，刘邓狼狈不堪地匆匆下令撤出工作组。与此同时，国务院方面担心局势失控，悄悄抽调了一批干部，以总理联络员的名义进驻各大中学校，企图在幕后控制局势。

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京召开，党内斗争进一步激化。经过党内各派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8月8日全会匆匆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著名的《十六条》。这是党内两大派势力相持不下的妥协产物。文件笼统地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具体如何进行这一革命，革命的主要目的是要炮打司令部，还是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件中充满了种种自相矛盾的说法。在困惑之中，全国朝野的目光都集中到了北京，集中到了正在动乱中的北京市各大中学校。为了影响运动发展的方向，以保全或谋求己方之利益，党内各派政治力量都开展了积极的幕后活动。在党内各派政治力量的操纵下，

北京市大中学校内，运动的发展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趋势。在西郊的大学区，各高等院校的造反派学生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风起云涌炮打司令部，极力把运动的锋芒向上引，引向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在城内，国务院方面则通过进驻各个中学的总理联络员，动员各个中学的干部子弟们冲出学校，走向街头，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极力把运动的锋芒向下引，引向党外，引向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与阶级敌人。

在这种风云变幻、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以干部子弟为主体的首都中学红卫兵异军突起，几天之内便被各种宣传媒介捧为国内外瞩目的明星。追本溯源，首都中学红卫兵最早是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少数干部子弟5月29日秘密发起成立的一个地下组织，是当时干部子弟们风闻彭真垮台，在学校中密谋造反，受到当局镇压后的产物。在共产党国家里，未经批准擅自结社，一向被视为非法和大逆不道。但在运动初期的特殊情况下，刘邓工作组一时间又很难对所谓红卫兵采取什么断然措施。7月底，北京形势逆转。中央文革指挥下的高校造反派，配合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极左派的攻势，高举起炮打司令部的大旗，猛烈冲击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国务院方面急需一支得心应手的别动队与之抗衡，以影响全国运动的发展方向。首都中学界，以干部子弟为主体的红卫兵正是最合适的人选。首都中学界的红卫兵虽然不是一个合法组织，但在非常时期，事贵从权。而且正在上中学的干部子弟们年轻、幼稚，对自己父兄所开创的事业，对党有着一一种发自内心的爱与忠诚，正是一支易于操纵和利用的力量。在各校总理联络员的鼓励和支持下，以干部子弟为主体的红卫兵组织，便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

八中的红卫兵组建于8月初。按照“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八中红卫兵几乎是由清一色的干部子弟组成。

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陈景贻兼任校红卫兵总部负责人。陈的父亲就是那位著名的元戎、国务院的副总理、周恩来的左膀右臂。陈是八中身世最高贵的干部子弟。在总理联络员的幕后操纵下，校红卫兵总部一方面严令出身不好的同学、老师每天必须到校参加学习，不准擅自到西郊各大学看大字报，一方面组织学校中的干部子弟走向街头，根据国务院的授意，破四旧，立四新。

在国务院与北京市新市委的统一指挥下，数万名干部子弟冲上街头，破四旧，立四新，一时间北京城里热闹非凡。国务院方面则通过报纸、电台大造声势，不遗余力地吹捧革命小将们的革命行动，似乎这就是文化革命的主要任务。

为了突出党外阶级矛盾的尖锐性，国务院指挥各中学的干部子弟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下，大肆搜捕居住在北京市内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一夜之间许多当年为躲避土改风暴而抛弃家园逃到京城依附子女的老头子、老太太们都成了十恶不赦，有可能危害首都安全的阶级敌人。他们被各校红卫兵扫地出门，强行遣返还乡，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为了免遭灭门之灾，他们的子女只有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白发苍苍的父母在皮带抽打下被押送回乡。没有人敢反抗，甚至没有人敢提出异议。

根据国务院的指示，各校红卫兵还在公安机关的配合下，在城区开展了打击“地痞流氓”的活动。大批生活社会底层，失学后不愿背井离乡，拒绝上山下乡的无业青年被当作流氓，当作社会主义的寄生虫而被抓进各个学校。长年受阶级及阶级斗争理论熏陶的干部子弟们在舆论宣传的影响下，对这些“社会的寄生虫”，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有一种刻骨的仇恨，把他们视为欲推翻无产阶级政权的阶级敌人。拳打脚踢不足以解恨，平时军训用的木枪，军用武装带都成了打人的工具。在审讯、拷打、制服反抗的过程中，年轻

人难免一时失手，误伤人命。在旧中国，人命关天，七品县令在堂上刑毙犯人尚有断送前程之虞，封疆大吏笔下冤杀无辜亦难逃摘去顶戴花翎之苦。然而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中国，堂堂国务院负责人却轻描淡写地表示，革命小将出于一时的义愤，失手打死几个阶级敌人，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如无亲属收尸，可直接送火葬场火化，开支可从各学校办公经费中报销。指示下达，干部子弟们士气大涨，一时间，北京城里打人、抄家成风。阶级敌人在皮带下的惨叫哀号与火葬场汽车的喧嚣使昔日宁静的校园变成了充满杀气的战场。在一片红色恐怖之中，出身不好的老师、同学个个胆战心惊，担心不知何时，那血淋淋的皮带、木枪就会落到自己头上。如果说“对联”在同学们之间划下了一条鸿沟，那么到八月中下旬，这鸿沟就已变为了不可逾越的“天堑”。天堑的一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小主人们，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他们对一切阶级敌人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天堑的另一边则是生而有罪，只能任人宰割的“黑崽子”与“黄崽子”们。

对于当时社会上种种现象发生的复杂背景，小苏并不十分清楚。但对于在同学之间按家庭出身划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小苏心中颇不以为然。说起来，小苏本人是一名不折不扣的革命干部子弟。六十年代初，按中共中央规定，在校学生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填写家庭出身时，凡父母早年参加革命，1945年以前入党者为革命干部；现仍系现役军人，1949年以前入党者为革命军人。小苏的父亲1938年入党，现任水电部党组成员，水利科学研究院的党委书记，一名正局级的官员，完全符合中共中央关于革命干部的规定。当然在八中这样干部子弟云集的地方，一名司局级干部根本算不了什么。校文化革命委员会12名委员几乎都是部长级以上官员的子弟。仅在高一（四）班的十八名干部子弟中，就有一人的父亲

是前任副总理，四人的父亲的是中组部、国家计委、经委，部长副部长级的官员。不过小苏的过人之处在于，他不仅政治上可靠，出身无可挑剔；在学习方面也是一把好手。从初中考上八中开始，他一直是班上学习的尖子，多次摘取过全班乃至全年级考试总分第一的桂冠。在八中这样一个人才济济、藏龙卧虎的学校中，小苏身为干部子弟却能摘取学习成绩第一的桂冠确实难能可贵。为此小苏不仅赢得了干部子弟们的拥戴，亦深受班上其他同学们的敬重。文化革命一开始，小苏便被全班同学一致推选为高一（四）班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负责人。红卫兵成立后，他又担任了班上红卫兵分队的负责人。

也许小苏的父亲并非真正工农出身的干部，而是早年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家庭中或多或少还残存着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也许小苏读书过于认真，有几分迂腐的书呆子气。他从一开始就不赞成“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提法。他天真地认为，我们共产党人是为人民群众谋幸福的，代表着全体人民的利益，似乎不应歧视任何人。马克思不是说过，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吗？何况主席也曾多次明确指出，统一战线是我们党多年来克敌制胜的法宝。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努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如果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标准来划分革命与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界限，那么在全班45位同学中，就只有18名干部子弟是革命的，其他同学难道都是不革命或反革命的？难道都是革命的对象？按这样的方式革命下去，我们共产党人岂不就成了孤家寡人，岂不就成了少数了吗？然而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又有几个人听得进一个十七岁年轻人的声音。

“八·一八”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首都百万革命群众，向全

国人民发出了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号令。这盛大的集会给了小苏巨大的鼓舞与启示。八·一八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所接见的革命群众不仅仅是干部子弟，不仅仅是红五类，也包括了出身不好的同学们，包括了来自各种家庭的年轻人。在主席心目中，显然一切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一切支持，参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年轻人都是革命的，都是可以信任、可以依赖的力量。

八·一八那天，当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时，小苏亲眼看到，许许多多两个月来一直因出身不好而被压得抬不起头来的同学们激动得热泪盈眶。“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那发自肺腑的欢呼声如春雷如海啸般震撼着整个天安门广场，震撼着古老的北京城。这是千百年轻人渴望紧跟伟大领袖去摧毁旧世界，摧毁一切不合理的旧制度，建立一个更美好的明天的心声。

八·一八已经过去四天了，许多同学，特别是出身不好的同学们，心情依然难以平静。他们从八·一八那盛大的集会上看到了党中央、毛主席对他们的信任与期望，看到了自身与整个国家的希望与未来。小苏意识到，这是一个稍纵即逝的时机，一个扭转前一阶段不正常局面，团结全体同学一道干革命的有利时机。为此，他今天力排众议，组织全班同学坐在一起开了这个座谈会。

到目前为止，座谈会开得很成功。同学们，特别是出身不好的同学们，发言十分踊跃，争先恐后地畅谈着自己八·一八当天及事后心中的感受。不少出身不好的同学激动地表示，今后一定要放下思想包袱，克服自卑心理，紧跟伟大领袖，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绝不辜负党中央、毛主席的期望。座谈会上生气勃勃的局面使小苏从心底感到欣慰。他在笔记本上认真地摘记着每个人发言中的精彩片段，准备会后尽快写出一份总结，向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及红卫兵总部汇报。事实最有说服力，事实也许会改变一些人的

看法。以天下为已任是年轻人常有的使命感。小苏不仅想扭转高一（四）班的局面，甚至还希望借此机会推动全校，乃至全市各中学形势的转变。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

出身历史反革命家庭，在班上社会地位最低的李佳玉刚刚发言，窗外的高音喇叭中便传出了校广播室播音员清脆的声音：

“……校红卫兵总部召开紧急会议。请各班红卫兵负责人立即到西小院会议室集合……”

现在开什么紧急会议，真有点煞风景。小苏的眉头轻轻皱了起来。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

窗外播音员的声音一遍又一遍固执地重复着。小苏有几分无奈地收起了自己的笔记本，轻声对身边的程湘滨吩咐道：“你先代我主持会议，作好记录，我去去就来。”

当小苏赶到西小院时，各班红卫兵负责人大多都已赶到。

西小院位于学校西北角。文化革命前，这里是体育教研室、劳动生产办公室和音乐教室所在地。文化革命爆发后，一切教学活动中止，西小院也就成了学校中人迹罕至的“边远地区”。校红卫兵总部成立，西小院被选为办公地点。总部政宣组、后勤组都设在这里。音乐教室被改建为会议室。

会议室中坐满了人，校红卫兵总部三巨头都在场。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校红卫兵总部负责人陈景贻就是那位著名的元戎的公子。陈是学校高三（三）班的学生。他身材修长，龙眉凤目，英武

之中有几分文静与清秀。陈虽然出身名门，却没有一般高干子弟那种飞扬跋扈、盛气凌人的气势。陈平常不爱讲话，更不爱在公开场合下出风头。他常穿一身旧军装，平时总是骑着一辆旧的自行车上学。从外表看，他一点儿也不像一位副总理的儿子。文革前，他学业平平，在学校中没有什么名气，文革爆发后，血统论的兴起把他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两个月来，接近陈景贻的人渐渐觉察到，陈不愧为将门之后，在文化革命的动荡与激变中，他表现出了一种处变不惊、指挥若定的大将风度，是一个喜怒不形于色，心计城府都很深沉的人。

校红卫兵总部的另一位负责人是李晓鲁。李的外祖父就是主管全国金融财政事务的副总理。李的母亲是那位副总理的独生女，父亲却是一位苏联人，一位苏共高级官员的儿子。中苏分裂后，李父返回苏联。李与母亲随外祖父一起生活，深得外祖父的宠爱。与陈景贻相比，身材粗壮矮胖的李晓鲁缺乏那种深谋远虑、运筹帷幄的大将风度，但他却是一名敢作敢为的实干家，特别是在对付阶级敌人方面，以狠著称，颇有一套。李晓鲁在学校主管保卫工作。在李领导之下，八中保卫组办公室近十多天来已成为校外阶级敌人闻风丧胆的“阎王殿”了。

校红卫兵总部的第三位负责人是乔勇。乔也是高一（四）班的学生，今年不过十七岁。但乔身材魁伟，个头足有一米八二。他浓眉大眼，方方的脸盘棱角分明，浑身上下充满了阳刚之气。乔为人耿直，刚正不阿，遇事敢闯敢拼，在校内素有拼命三郎之称，说起来乔的父亲只不过是解放军总后勤部中一个二级部的部长，官阶不过军级。在八中这类干部子弟云集的地方，乔本不具备统辖群雄的资格，尤其不具备统辖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及校红卫兵总部中那些部长级、兵团级、副总理级高干子弟的资格。但乔身上那阳刚之气，

乔的耿直，乔那敢闯敢拼的作风在全校干部子弟中享有极高的威望，因而被全校干部子弟公推为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与校红卫兵总部的负责人，成为学校中仅次于陈景贻的人物。乔主持学校的日常工作，并负责制定文化革命委员会的重大决策。乔与小苏同班，是小苏多年的挚友。

见到小苏，乔迎了上来。

“老乔，今天开什么会？”小苏好奇地问。

这两天乔一直很忙。根据国务院最高层领导的意见，西城区各中学正在筹建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以担负起维护首都革命秩序的重任。在即将组建的西城区纠察队中，陈景贻和乔勇都将担任重要职务。乔已基本无暇顾及班上的工作。昨天晚上，乔在与人闲聊时，偶尔听说小苏要在班上组织一次由全体同学参加的座谈会，乔顿时显出了极大的兴趣，当即表示一定要抽空参加。遗憾的是，今天一早，座谈会还未开始，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筹备组便来电话通知，国务院秘书局负责同志要召集西城区各中学红卫兵负责人开一次重要的会议，请乔与陈景贻务必出席。乔只好放弃到班上参加座谈会的计划，和陈一起匆匆赶往西纠筹备组开会。临行前，乔再三叮嘱小苏，一定要组织人力作好会议记录。对每个人的发言，记录得越详细越好。乔是早晨八点钟离开学校的。现在刚刚十点过一点儿，他和陈景贻便匆匆赶回来，召集全校各班红卫兵负责人开会。一定是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小苏从乔的眉梢眼底看到了一丝压抑不住的兴奋与激动。

“急什么，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乔没有正面回答小苏的问题。他顺手将小苏手中的笔记本拿了回去，一边翻阅，一边问道：

“今天班上的座谈会开得怎么样？”

“开得不错，大家发言都很踊跃……”

小苏措辞谨慎。作为乔的老朋友，小苏对乔很了解，知道他对于开这样一个座谈会肯定有不同的看法。

乔一面听小苏介绍情况，一面继续翻阅着小苏所作的记录，翻过几页之后，乔眼中突然闪射出一种异样的光彩：“嗯！这个座谈会开得很有意思，小苏，晚上你叫他们把会议记录送到我那里，我要好好研究研究。”乔把笔记本合上，还给了小苏。“是。”小苏心中怦然一动。作为乔的老朋友，他太熟悉那目光，那眼神了。那是战士发现敌情，猎人发现猎物时的眼神。

人员到齐后，陈景贻宣布会议开始。和往常一样，陈景贻的开场白简单明了。

“今天我们召开紧急会议是为了传达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最新指示，布置今天下午的行动。首先请乔勇同志介绍有关情况。”

乔走上讲台，全场顿时静了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乔的身上。

“同志们，”乔的声音平稳而有力：“今天早晨，西城区三十一所中学的红卫兵负责人在师大女附中举行了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除各中学红卫兵负责人外，还有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同志，新市委书记处书记丁国钰同志，首都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同志……”

一个个响亮的名字，一个个显赫的官衔在小小的会议室中回